



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

本书是二十世纪德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尼采的一部具有特殊重要价值的著作。尼采本人认为，在他所有著作当中，这本书的地位最高。

一生中曾不倦地对基督教进行批判的尼采，在这部著作中虚构了一个波斯人查拉图斯特拉——一种纯洁的宗教的创建人，作者通过这位神秘人物的无所不在的智慧，表达了自己全部的基本思想。但这些思想并不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读者阅读时须注意鉴别。

本书的写作风格独具特色，优美的铿锵有力的朗诵诗般的形式，使它被称为“尼采的叙事诗”。

仅供文学艺术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参考。

ISBN 7-5317-0079-4/1·80  
统一书号:10360·190 定价:3.00元

#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方舟

封面设计：周六炎 帅仕琦

##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chalatusitela rushishuo

〔德〕尼采著 余鸿荣译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成都希望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 281,000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

统一书号：10360·190 定价：3.00元

ISBN 7-5317-0079-4/I·80

（本书印刷装订质量如不合标准，请读者直接向承印单位联系调换，其寄书所付邮资，均由承印单位负担。）

W. Schell

# 尼采的生平 与其作品 / 代译序

## 幼少年时代

**家庭** 弗烈特李希·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于一八四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的偏僻小镇洛肯镇。父亲是路德派的牧师。母亲、外祖母的娘家皆担任牧师或教会的要职。一生对基督教充满破坏性攻击的尼采，就是出生在这种紧宗教化家庭里。

父亲卡尔，虽然有些神经质，但个性温厚和善，尤其喜爱音乐，而尼采爱好音乐，便是受父亲弹奏钢琴所熏陶。母亲芙兰兹丝卡，是信仰坚定且能干的女性。此外，有各差二岁的妹妹亚利莎贝特和弟弟约瑟夫，但弟弟二岁时即夭折。尼采五岁时，父亲不幸因脑疾去世，时仅三十六岁英年。于是全家人和祖母、两个伯母一起迁居到塞尔河畔的南姆堡。尼采十四岁时，在他的手札中写下离开故乡的哀伤。父亲的死，是因前一年从楼梯摔伤种下的祸根，或因先天性遗传导致，并不清楚。

南姆堡是以城堡为中心的古老美丽的市镇，对年幼的尼采而言，是从乡下的平安生活来到都市。他的个性踏实、和顺，而且可说是爱好孤独，又循规蹈矩，所以生活比较严谨。据说，朋友们都称他为“小牧师”。常和开朗活泼的妹妹一起游戏，擅长溜冰和游泳，很早就能作诗，也喜欢为圣歌作曲。

**旺盛的求知欲** 十四岁进入严格的住宿生活与以人文主义教育知名的公立普尔塔高等学校。这是诺瓦里斯、许勒尔兄弟、斐希特、洛克等知名之士，都曾在此求学的历史传统学校。在该校的六年时间，建立了尼采对古典教养的基础，使他对古代产生关心。可是他的旺盛求知欲，除了古典学以外，对文学、哲学、音乐、宗教等各方面，也极热衷，极力想扩大求知的领域。诚如他本人所说的，简直成为“病态的欲望”；也和一般早熟的少年一样，为知识的扩大与生活的不统一，感到苦恼。由于对文艺和艺术的兴趣，和朋友们成立一个名为“日耳曼尼亚”的小团体，亦即现在所谓的同仁杂志上，发表随笔、诗、乐曲等。他很喜欢写自传，其最初作品“我的生涯”就是在这个时期完成。

尼采喜欢阅读莎士比亚、赫尔达林、喜拉等作家的作品，尤其崇拜斐希特·爱默生。但从这个时代开始，使他一生痛苦的不明原因之头痛，时时缠绕着他。据学校的诊断：可能是因为遗传。眼睛也因近视而不方便。毕业考之后，学校对他的评语是：擅长德语的写作、正确的拉丁语学者，具有崇拜宗教的精神，但不擅长数学。他的毕业论文是用拉丁文写的“关于梅卡拉的特欧古尼斯”；特欧古尼斯是古代希腊的

悲歌诗人，为轻蔑民众的贵族性精神人物。

## 古典文献学、叔本华、华格纳

对古典文献学的热情 一八六四年进入波昂大学，首先研读神学系与哲学（文学）系，在这段期间，曾为依母亲的愿望成为牧师，或在知性方面做个自由的冒险家从事学问之抉择，感到徬徨。在大学决定专攻古典文献学（希腊、拉丁古典的语言学研究，其重点在原文解释与批判）的理由何在？可能是受到普尔塔的古典教育影响，加上其本身对古代的爱，以及对文献学家李契尔教授的崇敬与接受他的引导有关，甚至也和对神学的反感有关。

在波昂大学攻读一年后，随李契尔教授的调职，转学到来比锡大学。然后在教授的指导下，对原文的解释、典据批判等，有卓越的成绩。在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当时是主动地参加这种正确而严密的研究。为了达到客观而正确的认识，始终保持慎重性和机密性的文献学者之忍耐力，乍看来这与尼采的热情似乎无关，但实际上却是支持其对“知的诚实”的重要因素。这种情形能使狂热的精神获得镇静，成为规正生活不统一的合理力量，对尼采日后经常主张的“生活必须训练”具有重大意义。学生时代的尼采，狂热地研究文献学，也可能与此有关。他打从少年时代，就因过分地想扩大求知领域，与为生活之不统一而苦恼。想藉文献学规正生命的动机，很可能在选择职业之前，就在这位禁欲性的少年内

心里萌芽。事实上，从其以后的记录中，也可看出他这种直觉。

如果把尼采看成浪漫的冲动性思想家，则是最错误的观察。凡是对西洋的近代精神都可以说，非合理性事物的意欲和合理性事物进行战斗时，也是有强烈的合理精神做为依据。近代科学给予他的影响非常大。尼采也是从后来他所否定的十九世纪之历史科学，与在其影响下的古典文献学批判方法，吸收了近代科学的求证精神。他的思想就是以此为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论多么强调文献学对他的影响，也绝不算过言，况且他本人一直到晚年也始终未丧失做为文献学者的自觉。

叔本华 转到来比锡后不久，一个晚秋之日，偶然在旧书店看到一本书。他说“不知是什么魔鬼，告诉我要拿起这本书”，虽然书中充满忧悒、否定、绝望的气氛，但确信自己和自己使命的文体，以及作者人格的魔力，深深渗入他的内心。“连续两星期都到深夜二点才勉强上床，早晨六点即离床”，如此这般地沉浸在那本书中。偶然间给他启示的这本书，是叔本华著作的《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真可谓是十分戏剧化的精神性相遇，“仿佛是叔本华专为我而写的书”。

以完全相信对方的心情，几乎废寝忘食地读这本书，也许是因从开始就对哲学上的学说，不存任何怀疑。但实质上，站在否定生命立场的厌世思想家叔本华之说，与完全肯定生命的思想家尼采，其思想根本不能相容，所以尼采在晚年对这位感谢之师给予否定的批评，是早在当时就已有某种意识潜在。当时在他的手记《关于叔本华》(一八六七~八年)中，



便指出这位思想家艺术性的缺点。虽然如此，仍有某种东西在很远的地方冲击着他，使尼采十余年来，不断地受到最大的感动与震撼，同时引导他的生活方式。

《反时代的考察》第三部“教育家叔本华”(一八七四年)，是尼采对叔本华的讴歌。令人感到兴趣的是，文中所赞美的不是思想，而是赞美这位厌世家的人格和生活方式。尼采在叔本华身上看到的，是对生命的否定、对自我否定的恐惧不仅毫不犹豫，反而是对此持凝视的勇者姿态，也可以说是迪拉的古铜版书《骑士与死、恶魔》。尼采认为，叔本华之说并不是为证明而证明，而是对证明的结果产生真正的震惊，并诚实地、勇敢地在心里接受。叔本华并没有在心里盘算人生的不幸与绝望，相反地，他能面对这种情况，而且能对此忍耐，形成了他的伟大。在尼采踏入当时以古代的片断性知识及博识为目标的文献学者之世界的这个时期，又进入了不是部分性的知识，而是面对全面人生的叔本华世界。在尼采的生涯中，可以说这是他的命运性事件。

华格纳 再谈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于最重要的第十六章，引用叔本华的音乐论。其大意是“音乐不是现象的描写，是直接地描写其意志，所以对世界上一切形而下式之物，予以形而上式。对一切现象是表现其物体本身这点，与其他任何艺术皆不同。音乐是解除人类的《个体化原理》，能给予人从自然深处涌起的充满欢悦之情感，以及戴奥尼索斯式的连带感情、全一感情的唯一艺术”。由此，不是可认为本质上“有耳”的尼采，在叔本华所显示的否定世界的恐惧中听出音乐？果是如此，他在这里所听到的音乐，诚然就是他

自己的音乐体验，具体地说就是华格纳。亦即是，叔本华以所谓的否定作自我解脱，对此时期的尼采而言，是与华格纳以音乐造成自我放弃，而且完全投入此境界里，以及依喜欢的自我解救，是相一致的。

在体验叔本华的三年之后，于一八六八年，尼采首次遇到在他的生命中，引起最复杂爱情与憎恨涟漪的华格纳及柯吉玛夫人。尼采十六岁时就深受《崔斯坦与易梭德》的吸引，所以这次的会面使他既感动又兴奋，此后的十年时间，年龄相距三十岁的两个精神，结成尼采所谓的“星的友情”（尼采二十四岁，华格纳五十五岁）。一八六九年五月，成为巴塞尔大学年轻副教授的尼采，拜访住在托里普森的华格纳。当时的华格纳，正如《尼采传》的作者亚勒维所说的：他虽然已经得到至高的荣誉，但还没有因此而遭损坏的《尼贝隆根》作曲家。是诗人，也是作曲家、政论家、哲学家和革命家，极受国王宠爱。而此时的尼采就成为华格纳最热烈的理解者和皈依者，后来几乎成为其家族中的一员。

华格纳与尼采热烈地讨论叔本华哲学。“当我听到华格纳以无比的热情谈论到对叔本华的认识，并说叔本华才是唯一认识音乐本质的哲学家时，我有多么高兴，想必你能体会。”这是尼采写给朋友罗德的信里谈到和华格纳初次相遇的感受。后来写给朋友哥尔德尔的信上也说：“……我发觉将叔本华所说的“天才”相，分析得比任何人都清楚，而且唯一带给我启示的人物……就是华格纳。”从这些话里，不难发现尼采在华格纳身上首先看到的是叔本华，以及在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之中，听到华格纳的音乐。在尼采的眼里，这两者是同一个对象。因此，他从当初就在形而上学家和音乐家之中，分别

看出和他们的现实不同的另一种东西。换句话说，尼采是否在这两位杰出大师的身上，投下自己的形象呢？但不论是什么情形，尼采对这两位崇拜与感激，以及从他们身上受到的影响，却是绝对地真实，未掺杂丝毫虚伪或不诚实。这即是尼采对崇拜的固有特性。

《悲剧的诞生》 过去的希腊观是以“高贵的朴素与寂静的伟大”及“幸福的希腊人”为代表，是以极静态的掌握为主。这是依据近世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对这种情形，尼采提出“希腊性的开朗”，即在阿波罗（太阳神）式的深底处有更根源性的东西，那就是戴奥尼索斯（酒神）式的积极概念，想以此将过去的古代观，由多层性的厌世主义取代。今天，通常将阿波罗式与戴奥尼索斯式，用来作为文化类型或美术范畴的对立性区别，便是源于各本书。

这里所谓的厌世主义，虽然借用叔本华的思想，但其性格和悲观主义不同。叔本华视生命的根本为毫无意义和目的的盲目意志，于是否定生命，最后则以解脱生命为终极目标；然而尼采对于毫无意义和目的黑暗生命，仍站在予以肯定的立场。换言之，对叔本华的“虚弱悲观主义”采以“强烈的悲观主义”，是涌出过剩的力量，承认生命的严酷与破坏的厌世主义。由此，可看出尼采在以后主动地想接受虚无主义，而肯定戴奥尼索斯以及命运爱的萌芽。

这种肯定或承认的形式，在本书上是一种艺术。也就是掩盖戴奥尼索斯式事物的阿波罗式“假象”，以根源性的音乐精神为背景的希腊悲剧，从萨迪罗斯合唱（山林神怪、色情狂）产生爱斯基罗斯及索福克里斯的作品，而经由这些东西

所作的承认形式。确实是“唯有作为艺术的现象，才能承认世界的存在”（《悲剧的诞生》中的“尝试自我批判”），可是在此背后的是音乐精神，是混沌的无形“意志”及“本质”。如果缺少这些，想用形象、假象救济艺术，是不可能成立的。而且，“表象”和“现象”都变成令人无法忍受的平凡之物。这两个要素的力学，是贯通此书的主干。苏格拉底以后的主知主义，是失去作为背景的根本性意志的预感，如果以悲剧而言，希腊是从尤里匹蒂开始颓废，这就是尼采认为从此将失去两者的力学的看法。

苏格拉底在此被引用出来，受到攻击，乍看来会觉得很奇怪，但必须想到，从《希腊悲剧时代哲学》（一八七三年）开始，当时他写的大量遗稿片断，是以塔勒斯、赫拉克雷特斯、亚那克萨古拉斯等，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们，以及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们为对象，将这个时代予以理想化的情形。整理与分析在这个时期写成的无数遗稿，是今天研究尼采的中心课题。

尼采在这里特别强调，将露出恐惧与深渊的生命根底，以艺术肯定的希腊人生活方式；另一个动机是强调这些事情不是很遥远的旧事，而是正逐渐在现代德国实现，为此感到喜悦与信赖。叔本华的英知，与华格纳音乐成为一体的形而上学艺术，以德国音乐复兴希腊文化的可能性——尼采不仅是相信，而且认为有亲自参与其诞生与成长的义务。在这本书的第二十~二十五章中，加入华格纳音乐，虽有牵强附会之感，但不难了解他的动机所在。

《悲剧的诞生》的反应 华格纳夫妻对《悲剧的诞生》，

是以感谢及感动之情迎接，当然毋庸置疑。以华格纳为中心的音乐家、诗人、学者们，即所谓华格纳党也必鼓掌响应。可是，尼采的恩师李契尔，却以惊愕的心情看这个事件。抛弃恩师，将文献学奉献给华格纳做为宣传，对这样的徒弟，他的反应十分冷淡。而且在这本书出版后数月，发生尼采的普尔塔高等学校同窗，尔后成为德国文献学界巨擘的维拉摩维兹·梅尔连德鲁夫，攻击《悲剧的诞生》是学问的邪道，而尼采的朋友罗德与华格纳则在报上予以反驳的事件。总之，学术界对尼采的处女作之反应非常恶劣。这种反应，与尼采被称为“华格纳的文学仆人”是否得当无关，而是以此为分歧点，学问的世界与尼采欲寻求的真理之路开始诀别。尼采于不久之后，失去所有的理解者，走上孤独与冷漠之路，可以说明确地由此显示出来。

《悲剧的诞生》由于遭受到学术界的排斥，以致巴塞耳的学生们也受到影响，在这一年的冬季，凡是专攻古典文献学的学生，没有一个人出席他的授课。

这本书在十四年后，也是他发疯前二年的一八八六年，改书名为《悲剧的诞生》，或《希腊精神与厌世主义》发行新版，并在扉页增加“尝试自我批判”一文。就此时的尼采而言，《悲剧的诞生》是已成为回顾的书，因此加以解释和分析从出版以来自己的发展情形。所以，不难了解尼采把这一篇文章放在扉页的用意。但在本书，是将其放在本文之后，这是认为先看他的处女作，才是读尼采作品的正确方法。

**根本思想之萌芽** 在此处女作出版后数年间，他处在这一生还未曾有过的，双重精神生活的奇妙交叉时期。学术界

的酷评与恩师的冷漠，必使尼采感到难过，但是华格纳的感激，使“星的友情”更为昇高。另一方面，与此无关的，他在内心的清静的思索在当时是研究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腊哲学。于是以《关于真理的激情》《关于道德以外的真理与虚伪》两个重要论文为中心，他写下许多片断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尼采已经产生晚年之根本思想。以他独特的言论谈到，在一切空无的宇宙空间中，寻求真理者的激情，是走向虚伪的意志，一切真理是在恐惧与深渊之中。而人类知性为保持个体，不得不伪装那样的错觉，可是忘记了那是错觉的错觉被称之为真理。是只要发源于对生的深切需要，所有的虚伪也都是真理。对艺术的陶醉，也不在这里出现了。然后暗示在这种认识下，仍旧对“真理的激情”的古代希腊哲人们，尤其是对赫拉克贾斯特受到很高的评价，以及因引进观念而被扭曲的柏拉图以后的形而上学感到怀疑。

《反时代的考察》一面这样冷静地进行怀疑性思索，一面发表强烈肯定生命立场的《反时代的考察》四篇，此即为前面提到的奇妙的双重精神生活。

第一部“信徒及作家达维心·修特拉斯”(一八七三年)是当时对华格纳的奇妙友情仍持续的征候。尼采以成为当时话题的《新旧信仰》的作者，也是流行思想家的休特拉斯为对象，指出在普法战争胜利的外在昌隆之背后，潜在着德国文化的空虚。在某种意义上，尼采应该是站在比华格纳的神秘主义，更接近休特拉斯合理主义的立场才是。但他将代表进步主义者的一般“教养俗人”，视为华格纳与叔本华的敌人，毫不留情地加以抨击。

第二部“历史对生命的利弊”(一八七四年)尤为重要。这本书是批判当时过分偏向历史主义的学术界风潮，尼采极力主张过度的历史意识会扼杀生命，所以个人、民族、文化等，都需要对历史有适度的忘记和忘恩。唯有非历史性的、超历史性的，也就是创造性的精神，才是与历史一样，是人类的健康不可或缺的重要东西。这种情形实际上是他和古典文献学者的交往过程中，因有深切感受而产生的。

第三部是“教育家叔本华”(一八七四年)。

第四部是在复杂微妙的心理下写成的赞歌“拜尔德的华格纳”(一八七六年)。

“演员华格纳” 尼采与华格纳的友情，以处女作出版之年(一八七二)为最高峰，以后很快地就走下坡。这一年四月，华格纳夫妻为建造拜尔德剧场，离开托里普森，因此空间的隔阂使岖此产生了误会，但真正破裂的第一个原因，则是在尼采开始走向独自的道路以后产生的自觉。就尼采而言，由于自己走的道路，是合于老师的意图，因此必须加以保护和宣传。可是在华格纳而言，对这位年轻优秀的教授，仍旧只期望他成为一名宣传工作者，是华格纳主义的一名选手而已。

在这样的关系下写成的第四部，表面上仍对这位伟大的作曲家赞美，但其内面也蕴含冷静的批判及疑惑，所以尼采在拟出版之前有所犹豫。可是为证明友情的真实，在崇高的信念下毅然出版，遗憾的是，华格纳夫妻在这本书里，只能看出赞美部分。第四部出版之后，于一八七六年七月，参加庆祝拜尔德剧场落成的纪念大会，但尼采在那里只看到为成

功陶醉的大人物之傲慢，与愚昧的群众。这就是希腊精神的复兴吗？尼采觉得自己的理想之梦，完全幻灭了。至少，他希望华格纳能发觉这种表面性的成功的空虚，结果还是失望了。此时的华格纳，正热衷于基督教式的“帕西法尔”计划，但尼采在那里却看不到一丝信仰的诚实，所以认为这仅是大人物虚有其表的演员般行为罢了。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及其他作品中，就批评华格纳表现的伟大是虚伪的，将其视为“小丑”、“演员”、“魔术师”，予以戏剧化。尼采在离开庆祝大会时，带着黯淡的微笑，含着泪对妹妹说：“啊！亚利莎贝特，原来这就是拜尔德。”

有关尼采的生平，在此补述几件事。

一八七〇年（二十六岁）七月，普法战争爆发时，志愿从军担任看护兵，然因罹患赤痢与白喉，不到一个月就退伍，四月底返回巴塞尔。

在巴塞尔认识了最高贵的朋友——布克哈特。听到这位年长他二十六岁的天才硕学之讲演，深受感动。尔后在文化史上的历史观，深受其影响。一八七一年，发生使欧洲震撼的巴黎公社事件，劳工第一次树立政权，传出罗浮宫美术馆着火的消息。尼采闻言，产生无可名状的震惊与悲伤。在巴塞尔，尼采寻找布克哈特，布克哈特寻找尼采，但在错过之后，又终于相会。尼采的妹妹亚利莎贝特说，在布克哈特家关上门的房间里，传出两个男人的啜泣声。

另外，巴塞尔大学的同事，且是神学家的奥瓦贝克，也是很重要的朋友，他对基督教世俗化的批判，也给尼采带来极大影响。



## 自由精神——走向孤独

以上的情形，可将尼采归纳为崇拜天才、企图以艺术肯定人生的时代，但由于对拜尔德的失望，使这个时期结束。

**实证主义时代** 由于这种失望过于强烈，所以接着是和以前完全相对的孤独与否定的时期。排除过去从“天才”所受到的压力，成为解脱的独立者，对文化、道德、宗教等一切的价值，冷静地分析、批评、相对化。过去作为批评尺度的艺术，由“科学”取代其位置。因此，这个阶段也被称为实证主义时代。但对尼采而言，是不能按字面解释对科学或实证的信赖。他认为那仅是做为否定的武器，只是担任假面貌的角色而已。关于这个意义，容后详述。也可以说，以文献学的严密方法规正生命不统一的精神，再度复活。可是，以前对科学并没有距离，而现在则持有自觉性的科学态度。

不过如前所述，这种倾向是在写《反时代的考察》之时，内心已有了准备，而现在则显现在外。从这个时期，无论在身体上或精神上，不断地遭受痛苦。在见到荷兰女音乐家玛梯德·特兰达赫的同一天，就向对方求婚，此举令人诧异不已（一八七六年）。此外，他的头痛、恶心、目眩等也日渐严重。在巴塞尔大学的讲台上，再也见不到往昔如火焰般热烈的年轻雄辩家，以及诗人的相貌。他变成强度的近视、声音低沉的人，无精打采地谈论着柏拉图以前的哲学。一八七九年正